

# 蓝诗玲译《呐喊》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

黄仕梅 刘莹

广西财经学院 商务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摘要:** 鲁迅作品有着丰富的中国风味的文化词, 这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成为了许多翻译家和学者研究的焦点。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化, 还是文化的传播, 对于汉英翻译而言, 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处理两种语言中迥异的文化因素。研究汉学家蓝诗玲翻译鲁迅小说《呐喊》的文化负载词的策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为今天中国文化对外译介提供借鉴。本文通过对蓝译本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例子的分析, 总结蓝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策略, 借助蓝诗玲的翻译和传播, 鲁迅作品塑造的繁复且丰饶的话语体系成为世界“开眼看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关键词:** 蓝诗玲; 翻译; 文化负载词; 《呐喊》

##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al Loaded Words in Julia Lovell's Translation of "Na Han"

Huang Shimei, Liu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Business,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Guangxi 530000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hinese culture-loaded words in Lu Xun's novels, the translations of which have been the focus for many translators and scholars. Some typical example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from Lu Xun's novel *Na Han* will b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with English versions from Julia Lovell. Through analysis of examples, it summarizes the translating strategies in Julia Lovell's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at, it will be easier for foreigners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for avoiding misunderstanding. Moreover, Chinese cultural-loaded will absolutely enrich the language.

**Key Words:** Julia Lovell; Translation; Culture-loaded Words; *Na Han*

### 1 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起, 国内外就开始有很多学者对文化负载词进行了不同的定义阐述。1996年, 文化专有项 (culture-specific items or CSI) 的概念率先由西班牙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哈维·佛朗哥·艾克西拉 (Javier Franco Aixelá) 提出。艾克西拉 (Aixelá, J.F., 1996) 在他的《文化专有项的翻译》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一书中提到: 文化负载词包含一个国家的文化, 是一种民族语言中人们使用的, 与该民族文化背景相关的词汇习语等, 在另一种民族语言中找不到完全对等的表达方式。国内学者也对文化负载词汇给出了各自的定义, 其中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定义是廖七一 (2000: 232) 的概述, 他认为文负载词是标志某

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 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总的来说, 文化负载词汇 (卢晓娟, 2019) 是存在于源语言中的某些语言现象或文化术语, 由于历史背景、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在目标语言中找不到对等语或相应的表达, 从而形成的独一无二、此有彼无, 又具有独特民族风味的词语, 即称之为文化负载词, 包括习语、社会习俗、宗教寓言、物质名词和度量衡等方方面面的生活用语。语言学家、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Nida, 2001) 认为文化负载词是那些被认为专属于某种文化并与其他文化中的词语有相通之处, 却又不属于另一种文化的词语。《呐喊》代表了鲁迅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收录了鲁迅的14篇短篇小说, 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

收稿日期: 2023-3-9 修回日期: 2023-3-22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 立项编号: 2020KY16014

作者简介: 黄仕梅 女 广西南宁 广西财经学院 商务外国语学院

刘莹 女 广西南宁 广西财经学院 商务外国语学院

到“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本文先对《呐喊》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再从蓝诗玲译本中选出相应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研究,总结出蓝在文化负载词研究时应用归化、异化理论的几个原则。

## 2 文化负载词的分类

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有不同的标准。对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有必要了解文化的含义和分类。根据奈达在《语言·文化·翻译》(2001)一书中的文化观,文化涉及语言文化、物质文化、生态文化、宗教文化和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文化负载词汇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语言文化负载词汇;物质类文化负载词汇;生态类文化负载词汇;宗教文化类词汇;社会文化类负载词汇。本文中主要以奈达的文化分类为标准,对《呐喊》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和举例说明。蓝诗玲在参考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威廉·莱尔译本的基础上,给出了她极具个人特色的译本。

### 2.1 语言文化负载词汇

语言文化负载词指的是包含特定文化背景及内涵的语言形式,是从语言特点层面对文化负载词进行的研究,其中包括语音、词汇和修辞等方面。

《呐喊》中包含大量的方言,带有浓厚的文化特色,更好地反映了中国语言的特征。相比其他文化负载词而言,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难度更大。例如《呐喊》中的“陈年流水簿子”“十世单传”“痰毙”“咸与维新”“割骨疗亲”等。汉语属于意合语言,英语形合语言。汉语同英语相比其词汇、语法衔接、语义上的显化度都相对较低。在某种程度上,每种语言的独特性给翻译带来一定障碍。

### 2.2 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文化负载词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包括衣服、生活用品和日常工具等,能直接代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新文化运动给人们提供了很多关于物质的独特文化词,《呐喊》中有许多与中国封建时期相关的物质文化负载词,如“十九个钱”“纸钱”“著之竹帛”“阳文”“哭丧棒”“狗气杀”等。这些文化词在目的语中没有对应的词,不仅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也对英语读者带来了很大的阅读困难。

### 2.3 生态类文化负载词

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与生存环境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会有自身特有的生态文化。每种语言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和背景都不尽相同,最终代代相传并在语言中传承

发展。这些生态因素在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生态文化负载词包括季节、植物、沙漠和山丘等。在《呐喊》中也能看到像“瓦楞”“竹匾”“鬼见怕”“火克金”等类似的生态文化词汇。

### 2.4 宗教类文化负载词

宗教是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文化负载词反映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翻译者翻译有关宗教词汇需要重视利用恰当的方法将原文宗教文化再现。例如《呐喊》中的“阎王”“法眼”“观世音娘娘”“夜叉”“土谷祠”“阿弥陀佛”等词。很多这种类型的文化词来自宗教传统。中国三大宗教的文化——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对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一些说英语的国家,主要信奉基督教,很多词汇和文化也与基督教有关。宗教的不同因此又给翻译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 2.5 社会文化负载词

社会文化负载词涉及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社会活动以及习惯性称谓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等。这些元素甚至在中国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也是中国作品的一个特点。如《呐喊》中的这类的文化词就特别多,如“著之竹帛”“满门抄斩”“秀才”“知县”“衙役”“文童”“社戏”“裹脚”“发痧”等。

## 3 蓝诗玲英译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蓝诗玲在语言创造性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赋。蓝诗玲洞悉翻译之“忠实性再创造”的本质,重视语言差异和文体考量,关注文化差异和读者接受。蓝诗玲的译作成功地赢得了学者和读者的赞誉。她在介绍鲁迅作品和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谈到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时,异化和归化是中国文化负载词的两种主要翻译策略。王丽慧(2014)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分为两类:1)归化策略的翻译,包括意译和替换;2)异化策略的翻译,包括音译、直译和音译加注。在蓝诗玲的翻译中,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优先采取归化作为主要的翻译策略,在翻译《呐喊》中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词语时,主要包括意译、代译和解释性翻译。

### 3.1 归化

归化是指运用流畅易懂的文体,将目标读者对

外国文本的陌生感降到最低, 准确传递原文信息, 清除语言文化差异的障碍, 即所谓的“让作者贴近读者”(方梦之, 2013: 50)。奈达是归化翻译的代表之一, 他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中说: “有些人认为每种语言都很独特, 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将一种语言的话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所有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相当相似的, 语言的普遍性超过了差异性”(Nida, 2001: 106)。这部分主要分析自由翻译、替换和解释性翻译。

### 3.1.1. 自由翻译

自由翻译是一种重要的翻译方法。它保留了源语言的内容, 而没有保留原文的形式。在翻译中, 不仅要向目标读者表达原文的内容, 还要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修辞风格和句法形式。自由翻译认为, 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 有必要采取自由翻译。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开端, 鲁迅小说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创新的语言形式和深刻的精神内涵。在翻译中, 由于汉语和英语的差异, 有些形式是无法在目标语言中再现的。但是, 如果不顾英语写作习惯, 盲目采用直译, 会使目标读者很难读懂。因此, 为了给读者提供顺畅的阅读体验, 蓝诗玲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自由翻译的策略。

#### 例1:

原文: 只有廿年以前, 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 踹了一脚, 古久先生很不高兴。(鲁迅, 2017: 9)

译文: All I could think of was that twenty years ago, I stamped on the Records of the Past, and it has been my enemy since.(Lovell, 2009: 22)

#### 例2:

原文: 单四嫂心里计算: 神签也求过了, 愿心也许过了, 单方也吃过了, 要是还不见效, 怎么好?(鲁迅, 2017: 32)

译文: She had drawn lots, she had beseeched the gods, she was thinking to herself: she had even given him medicine. What else was there left for her to do?(Lovell, 2009: 46)

例1中的“陈年”形容古九先生的账本经历了很长时间, 表达了主人公对它的赞赏。“陈年流水簿子”是一个形象的表达, 指的是中国封建统治的悠久历史。蓝诗玲将“陈年流水簿子”翻译成“过去的记录”, 这与源文本中隐藏的深层含义相比, 可能有些抽象, 但它可以通过将异质元素变为目标语言读

者所熟悉的内容, 最大限度地减少源语言文本的外来性。

例2中的“神签”指的是有编号的竹片, 上面有一些诗句, 供有信仰的人祈愿, 以预知未来。蓝诗玲把它翻译成“抽签”, 基本上表达了原来的意思。“愿心”是指向神灵许愿, 这在《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中首次提到。蓝译为“她向神明祈求”, 正式再现了原文的意思。“单方”是指一种单一的草药或药味, 与“复方”相反。蓝把它简化为“药”, 对英语读者来说简单而清晰。在这里, 鲁迅用这三个词来强调单夫人对儿子的疾病治疗毫无办法的焦虑。

在英语中找不到这三个词的确切对等词。但任何一种语言文化的人都有足够的想象力和经验来理解另一种语言文化的人在行为和价值观上的正确差异, 因为单一文化内的行为差异通常比文化间的差异更大(Nida, 2001: 106)。蓝在处理这些带有文化色彩的词汇时主要采用了归化法, 以确保可读性, 其翻译能很好地适应英语读者的文化背景。

### 3.1.2. 替换

替换是指用目标文化专用词替换源文化专用词。因此, 替换原有的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可以帮助目标读者在其认知环境中轻松理解原作者的目的。

#### 例3:

原文: 他们一一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 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 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鲁迅, 2017: 9)

译文: Those people. They have been pilloried by their magistrate, beaten by their squires, had their wives requisitioned by bailiffs.(Lovell, 2009: 23)

#### 例4:

原文: 因为小鸡是容易积食, 发痧, 很难长寿的。(鲁迅, 2017: 118)

译文: Because chicks have delicate stomach and easily fall ill, very few reached maturity.(Lovell, 2009: 145)

例3中的“知县”是明清时期对官员的称呼, 即“七品芝麻官”。事实上, 蓝的翻译“他们的县长”与原文的意思有很大的不同。县官是指在处理轻微犯罪或纠纷的法庭上担任法官的官员。所以magistrate在文化上与古代的“知县”不同。“衙役”在这里被翻译成“bailiffs”, 而“bailiffs”(法警)

在美式英语中是指在法庭上维持秩序的官员，把人们带到他们的座位上，看管犯人等。“衙役”在中文里是指为衙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府机构）工作的人，所以“法警”在语言上与“衙役”不同。由于中英文化的差异，一些带有文化色彩的词不能有形式上的对等，而是动态的对等。

例4中的“发痧”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术语，类似于中暑。蓝将其翻译为“生病”，是为了让没有中文或对中国知之甚少的英语读者能够理解。

中英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是相互孤立的，在语言上也是非常遥远的。经常有一些历史和文学上的参考资料，你必须创造性地向读者解释。蓝诗玲说：“我认为翻译问题基本上无处不在，特别是如果你要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是相互孤立的，而且在语言上也非常遥远。往往有一些历史和文学参考资料，你必须创造性地向读者解释”（王宝荣，2014：5）。

### 3.1.3 解释性翻译

蓝诗玲在处理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时倾向于采取解释性翻译，通常是音译加上一些解释。解释式翻译是译者面对文化负载词时采取的一种很好的策略。

例5：

原文：杨二嫂发现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鲁迅，2017：64）

译文：Exceptionally, pleased with discovery of hers, she flew out of the door, scooping up en route a wooden trough covered over by a grille that we'd once used to prevent dogs getting at chickenfeed.(Lovell, 2009: 78)

例6：

原文：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鲁迅，2017：39）

译文：It was the winter of 1917-the sixth year of our new Republic-the north wind scouring the city in great, fierce gusts.Early each morning, in the interests of making a living, I would take myself on to the almost deserted streets of Beijing.(Lovell, 2009: 53)

物质文化中的“狗气杀”是用来描述中国南方农村喂养家禽的器具。它是以防止狗或猫偷吃鸡饲料而出现的。在英语中没有相应或类似的表达方式可以替代，因为它指的是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蓝的翻译（王海珠，2017）针对的是对这个词

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普通英语读者；考虑到一般的非中文读者，蓝通过添加背景信息来帮助目标读者轻松理解整个翻译文本。

例6中的“民国”指的是中国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从1912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蓝将民国时期的原始历法翻译成西历，并将解释日期放在一起，使目标读者能够理解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元素，从而形成一种更为普遍的日常风格。考虑到英语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文化背景，蓝选择了进一步补充信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蓝诗玲成功地将背景信息不露痕迹地融入文本。关于为什么蓝诗玲在文本中而不是在脚注或尾注中添加一些信息，这可以从她的采访中观察到。

我不太喜欢在我的译文中使用脚注。如果有些东西我觉得英语读者需要直接注释，我会在文本中添加几个字，因为我觉得这样更接近中国读者的阅读体验。中国读者读到一些东西，会直接知道它是什么。但是英语读者需要对应的注释。中国读者不希望翻到书的后面，甚至翻到页面的底部。但我只有在可以相对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如果它真的如此复杂，那么你就知道需要一个注释。正如蓝诗玲自己不时强调的那样，她是为普通英语读者翻译的，强调普通读者和对中国文化的掌握，促使她通过采用解释策略来适当处理带有中国文化的词汇，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

## 4 结论

翻译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过程，每个译员都会带来不同的技巧。在许多情况下，目标语言和源语言以不同的表达形式表达相同的意思，因此很难将其翻译成与原文相同的效果目标语言。在某些情况下，一篇文章在源语言中可能是不标准的方言，而译者则面临着在目标语言中找到适当的对应物的困难(Nida, 2001: 112)。至于蓝诗玲在将鲁迅的小说翻译成英文时的选择，她主要采用了归化的方式来再现她的翻译。她把鲁迅带到了西方，并设法尽可能少地干扰目标读者，就像作家用英语写的一样。因此，她的译本比以前的鲁迅小说译本更被英语读者广泛接受。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由于她的翻译非常适应目标语言的生态环境，在鲁迅的写作意图和风格方面，在一些独特的文化词汇或表达方式方面，它不能给英语读者带来与原文读者相同的阅读感受。

## 参考文献:

- [1] Aixelá, J.F. (1996).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In R. Alvarez & M. Carmen-A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pp. 40-64).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2] Aixelá, Javier Franco.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52-78.
- [3] Baorong Wang. An interview with Julia Lovell: Translating Lu Xun's Complete Fiction [J]. *Translation Review*, 2014: 1-14
- [4] Eugene A.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5] Julia Lovell.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 [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9
- [6] 方梦之. 翻译策略的构成与分类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3(3): 47-51.
- [7]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8] 鲁迅. *呐喊*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年8月.
- [9] 王丽慧. 文化等值视角下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期.
- [10] 王海珠. 基于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蓝诗玲译者惯习研究 [D].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7.
- [11] 王银泉. “福娃”英译之争与文化负载词的汉英翻译策略 [J]. *中国翻译*, 2006年第3期.